

佛
教
語
言
論
集

[德] 威廉·蓋格等著
李榮熙等譯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贵州大学出版社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B948-53

30
佛
教
語
言
論
集

[德] 威廉·蓋格等著
李榮熙等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贵州大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佛教語言論集 / (德) 威廉·蓋格等著；李榮熙

等譯。— 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3.12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ISBN 978-7-81126-647-4

I . ①佛… II . ①蓋… ②李… III . ①佛教—文集
IV . ①B94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3) 第 294744 號

佛教語言論集

著 者：〔德〕威廉·蓋格等

譯 者：李榮熙等

責任編輯：史達寧

出版發行：貴州大學出版社

印 刷：貴州創興彩印廠

開 本：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張：10

字 數：270 千

版 次：2013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書 號：ISBN 978-7-81126-647-4

定 價：60.00 元

版權所有 違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社聯繫調換

電話：0851-5981027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學術委員會

- 方立天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樓宇烈 教授(北京大學)
黃心川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楊曾文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風雷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宣 方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李四龍 教授(北京大學)
龔 隽 教授(中山大學)
馮煥珍 教授(中山大學)
洪修平 教授(南京大學)
徐文明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
王雷泉 教授(復旦大學)
陳士強 教授(復旦大學)
麻天祥 教授(武漢大學)
藍吉富 教授(中國臺灣)
林鎮國 教授(中國臺灣)
宋立道 研究員(中佛協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出版前言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屬於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立項的“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第一期工程已經得到貴州省新聞出版局的出版基金資助。這個《文庫》的總編纂指導者是國內著名佛教學專家。參與編纂工作的有老中青三代學人。中青年學者們都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成長起來的佛教學才俊。老一輩的學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學的樓宇烈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名譽學部委員黃心川教授和楊曾文教授等。承擔《文庫》出版任務的是我們貴州大學出版社。本出版計畫分為三期工程進行，計畫搜羅或再版國際佛教學研究界的最重要作品，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國（含臺灣地區）、日本和歐美的佛教學研究界在過去二百年中的標杆性作品。

本《文庫》為開放性的出版項目，其最終出版的規模大小，取決於所涉及作品的版權的解決，更取決於貴州大學出版社的經濟實力，也取決於參與本《文庫》從推薦書目到編纂出版的合作者的努力。本社之所以不自量力，承擔了這麼一個耗資大、耗時長而費力甚艱的文化工程，所企望者，是為國內的佛教學研究界提供一批便於利用的經典之作，為中國的文化建設與文化繁榮盡一個出版者的綿薄之力，當然，也還有巡禮過去二百年來世界佛教學研究中輝煌成果的用意。我們相信，佛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精神財

富之一。佛教學研究是全人類共同的宗教學術探索的精神活動，它也是東西方人文學者的精神創造力的結晶。

佛教原本是東方思想寶庫當中的最重要的一份財富。兩千多年前，佛教在印度誕生。從那裏向四面八方傳播，在南方形成了巴利語佛教；經西北方的中亞向遠東傳播，形成了漢語系的佛教。佛教思想在漢、韓、日的民族文化當中生根發芽，開出了朵朵奇葩；佛教也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尋到了自己的家園，孕育出神奇瑰麗的藏語系佛教文化。對於西藏佛教的關注，從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已經成為世界宗教文化研究的熱點。這三大語系的佛教，又稱為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其中南傳佛教，因為其教理教義上距佛陀本人生活佈道的時期最近，往往被認為深得原始佛教的真義，是初期佛教部派時期的上座長老們的傳統，故也稱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的經典語言是中古以來的漢語，故也稱漢傳佛教。漢語系的經典，從公元之初以降，及至近代，一直使用漢文書寫流傳於世。佛陀的言教，雖然譯自當時的梵語或中亞地方語言，但一經寫為漢文佛典，也在古代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通行無阻。藏傳佛教的經典形成於十世紀以後，書寫系統和宗教內涵都深受印度思想文化的浸淫。

從空間位置上看，誕生於古代印度的佛教，雖然向四方傳播，但其最顯著的成果則祇在東土和南方顯現。在世界史上的公元之初，佛教並未涉足北方的西伯利亞草原，當時那裏生活的遊牧人群，還無緣沐浴印度的思想光輝；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因為先已有燦爛的希臘羅馬文明，更有新近誕生的基督教，以及在中近東已經存在上千年的猶太宗教，佛教大約祇能止步於彼。儘管如此，在公元後的最初數百年間，佛教也已進入西方人的視野。在馬其頓希

臘帝國的亞歷山大皇帝眼中，佛教祇是東方斑斕而陸離的諸多宗教文化之一。

以歐洲為代指的西方世界對佛教的真正興趣始於近現代。西方人對佛教的留意，開始於他們在東方的殖民經營。西方學術界對佛教的研究，說來也祇有約二百來年的歷史。歐洲經過了工業革命並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以後，歐洲文化也挾商業主義和殖民主義之勢向東方侵入。歐洲的宗教、歐洲的思想文化和歐洲的價值觀念，在數百年當中橫掃東方世界，對那裏固有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起了巨大的變化。西方世界對於亞洲佛教的興趣、關注和研究，正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模式自西而東的大趨勢中產生的文化副產品。

本《文庫》的作品遴選，祇是基於中國佛教文化的立場，出於中國佛學的視角。其所關注的是佛教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即佛教的經典與教理、宗派與學派、佛教的制度、佛教的實踐，以及它們同佛教所寄身的社會和依存的文化傳統間的內在聯繫。《文庫》力圖包容含攝的，除了近現代中國優秀學者的著作，更多屬意於歐美的和東瀛日本的佛學著作。本《文庫》的涵蓋時間，僅及過去的二百多年，自然不能代表佛教在二千五百年來的全部的思想創造與文化積累。但因其側重的是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成果，而驅動這一學術探索活動的，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科學與理性是西方佛學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所有的佛學研究成果便具有了與東方世界古來傳統迥然有異的現代精神含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我們編纂這部《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的本意。

對我們中國而言，佛學研究，古已有之。廣義的佛教學或佛學研究，起步於二千年前佛教傳入中國之時。但從那以後，傳統的佛

學研究是服務於宗教解脫目標的，與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有很大的意義差別。傳統中國的佛學研究，最初的對象雖然自外而來，但活動則是一個文化體系內部的自我研究與自我發現，而近現代西方的佛學研究，則多半是來自外部的學術干預。借用後殖民時代的說法，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視角則完全自外而來的、“他者的”眼光和態度，這種研究隔著雙重的距離——文化的距離感、時代的距離感。從常情上說，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研究者不可能不帶著先有的“成見”或“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涉入。按專門研究現代性的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說法，研究者或觀察者在理解時，已經受到“視域”的限制，他們不得不受制於研究對象的文本和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立場。吉登斯稱其為“*double context*”（雙重的視域），也就是來自研究對象和研究者自身兩方面的限制，其研究與考察與佛教傳統背景、與學者的知識結構、文化立場與態度都密切相關。

以往傳統當中的佛教學者，無論僧俗，都是佛教的信仰者，其佛學研究的根本目標指向宗教解脫。其學術活動的起點與終點，都祇能是要想達到“解生脫死”，具有強烈的解脫實踐的特點。西方的佛教學研究，以及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其學術研究活動並不必然聯繫於宗教目標，這首先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二百年來的西方佛教學研究，經歷了“宗教學的一民族學的一人類學的”方法論和目的論過程，大致屬於世俗的學術研究。從宏觀方面看，他們借鑒了西方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方法，而在更加技術性的層面，他們在研究當中，也就坦然地採取了比較語言學的、考古學的、文獻學的手段。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佛教學研究領域內出現的詮釋學研究方法，也大量

借鑒了後現代和後殖民研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

就此而言，我們的東鄰日本，其佛教學研究，從明治維新以來，也逐步脫離了以宗教解脫為目的的治學實踐，循著世俗主義的學術路子前進。在保留和繼承佛學研究當中的優秀學術風格與手段（文字訓詁、文獻考訂、史論結合）等的同時，日本佛教學研究也吸收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甚至社會文化批評的方法。就日本佛教學術界言，其所產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纍纍碩果，都產生在十九世紀以降，在日本學者接引了來自西方的，尤其英國和德國的宗教學研究方法之後。

有鑑於以上的原因，我們出版的《現代世界佛學文庫》，致力於搜羅過去二百多年來歐洲與北美的，以及日本的近現代佛教學研究作品。這裏的“近現代”，既有時間上的，也是以理性主義為特質的現代研究方法論意義上的。

佛教學研究是學術性的研究，究其本底而言，與政治目的無關。但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在涉入研究領域時，又不免受到其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價值論立場的影響。因此，學者的發言主張，及其學術結論也不免受到時代政治風氣、學術風氣的影響，在有的情況下，其研究方法也難盡脫政治文化的干預。我們在肯定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世界佛學研究成果時，另一面也要小心謹慎，言所當言，止所當止。

本《文庫》總結過去二百多年來的佛學成果，大致劃分出以下三個階段的時間框架：

一、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中期。這一時期，學者們大都致力於用比較語言學的、古文字學的和文獻學的方法來處理佛教的歷史與經典，力求揭示佛教的“本來面目”，力圖展示佛教內在的

“不變的本質”或者“真相”。正是這一時期，形成了三種佛學研究範型：英國—德國學派的，俄國“列寧格勒學派”的，以及法國—比利時學派的。

二、二十世紀中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可以看作法—比學派的學術風格的繼續發展，其他的兩家已經式微。此期的佛教學研究，在原有的語言學、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更多引入了社會科學的多種方法，諸如政治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技術手段被大量植入，而當詮釋學方法引入這一領域後，西方佛學研究更多地呈現了社會關懷和政治批判，不再祇是純學術的“象牙塔”內的學問。

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佛學研究。繼續發揮前兩個階段的優秀學術特點，而隨著西方世界這一時期逐步展開的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批判，隨著普世價值觀和文化多元態度的形成，歐美的和日本的佛教學研究也都開始涉及了帶有“後殖民”與“後現代”色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批判活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洋”日本的佛教學。它的展開，大致與上述三個時段同步。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佛教學術界，先是借鑒和遵循英德佛學研究的路子，如今則多與北美的佛學研究界聲氣相通。當前日本的佛教學研究，除了配合對日本宗教文化與思維的自省與批判，還有研究的細碎分化傾向，不過這正是社會文化多元發展在佛學研究領域內的反映。

經過兩年的努力，《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第一輯終於問世。我們希望奉獻於文化界和宗教界的這些經典作品，能夠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與重視。我們懷著出版人的恭謙與惴惴不安，期待來自社會各界的學術批評和對我們的編纂工作的技術批評。

最後我們非常抱歉地在這裏聲明一句，由於著作權許可的聯繫工作的實際困難，我們這套《文庫》的作品，有的尚未得到原著者或翻譯者的授權。於此，我們懇請諸位大德同我們出版社聯繫，以便我社同權利人辦理相關的授權協議事宜。再次為我們的冒昧致歉，并表達深摯的感恩之情。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貴州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月

本冊說明

佛教發源於印度，綿延發展數千年，并傳播到世界各地。其所產生的佛典，數量之多，是其他世界各大宗教所難以比擬的。

分布在各地區的佛典，都譯成各地區的本土語言在傳播着。譬如在漢文、藏文、中亞語言、東南亞語言、日文、韓文等文字圈裏，都存有汗牛充棟的佛典。這些佛典雖然也有譯自其他文字的，但是究其最初根源，當然都來自印度語文。在印度，用來記載、轉述佛典的文字，并不僅是單純的一種而已，至少，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純粹梵文等三種語文都曾被應用過。從上述這一簡單的陳述，至少會使我們粗略地理解，佛教的語言問題是相當複雜的。要研究印度佛教，要理解釋尊的教理及其歷史發展，對佛教的相關語言，是不能忽略的。

本書收集的是與佛教語言有關的七篇論文。內容包含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純粹梵文文法，以及有關原始佛教語言問題的論辯文字，與漢譯音譯對照表等。雖然不是佛教相關語言的全部，但至少對記載大小乘佛教的梵文、巴利文問題，已提出若干厘清概念的看法。相信對有意研究佛教語言的讀者，會有若干啓示作用。

目 錄

巴利語之起源	1
試論“巴利”(Pāli)一詞的含義	9
巴利語文字簡況及其佛典	15
佛教混合梵文導論	29
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	69
梵語語法《波你尼經》	187
兩部漢譯《俱舍論》中的音譯對照表	265

巴利語之起源

威廉·蓋格 著

李 榮 熙 譯

巴利語之起源

巴利語即記載流行於錫蘭及後印度之三藏聖典，及其附屬作品之語言。“巴利”一詞之含義為“典籍”或“聖典”。通常以巴利一詞代表巴利語者，實為“巴利巴沙”（巴利語）之簡稱而已。

巴利語為古代普拉克里語，即中古印度之一種俗語。其特點正與區別中古印度語及古印度語之特點相同，然巴利語非直接由梵語演變而來者。因其中有若干特點暗示其與吠陀典籍有密切之關係。作巴梵二語字形之比較研究時，必須注意此點。蓋巴利語非從梵語直接演變而來，而係后起獨立之字形也。

巴利語非一種單純性質之語言。若干雙形字顯示其為一種混合性的語言，含有大量之方言特殊性。巴利語之發展階段，每一時期皆清晰可辨。其發展階段有四。

一、伽陀語言階段。伽陀即頌文也。其性質甚為複雜，一方面含有許多古代白話語字形，另一方面則含有大量巴利語所獨有的新字形。此種新字形與古字形參雜并用。有時為適合韵脚需要，而決定采用某種字形，尤其在古頌譯成新頌時，則大量采用古語字形，以求接近於原文。

二、經典散文語言階段。此一階段較之前一階段更為單純一致，古字形漸次減少，有時則全然消失。采用新字形已非如最古時期偶一為之而已，而須按照嚴密之法則使用字形。

三、後期散文語言階段。如《那先比丘經》及其他重要論疏等。此階段仍以經典散文為基礎，而反映出精湛博學之字形使用規則。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間之區別，大於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間之區別，第三階段之特點為進一步限制使用古語字形。

四、後期詩歌語言階段。此一階段已全無同類型之性質，此一階段之作家毫無辨別地從較古或較近文學作品中獲得巴利語之知識及借用白話字形。彼等傾向於擬古主義及梵文主義之趨勢，在不同情況之下多少有所流露。

目前一致公認之意見，以為巴利語為一種多種方言混合而成之語言。克恩氏曾強調指出此點。明那耶夫氏之意見亦與其相近。然孔氏曾正確地指出：如僅僅指出巴利語為人為的語言，則其問題仍未獲得解決。“即使其為人為的文學語言，從各種方言中吸取材料，但其本身必有一特殊方言以為基礎。”現今對巴利語之間題為：作為巴利語基礎之語言，究竟發源於印度何地。

根據錫蘭流行之傳說，巴利語即摩竭陀語，亦即佛教興起地區之語言。此點至為主要。蓋以此論點為依據，佛教傳統則宣稱巴利語三藏係用佛陀本人之語言所記載。因此，較之其他文字記載，唯有巴利語藏能代表原始典籍。據此理由，摩竭陀語亦名為“木拉巴沙”（原始語），為最初肯定佛語之語言，而其他文字記載則被認為係次等記述。

但亦有有力論據，否認巴利語為摩竭陀方言，或係以摩竭陀語為基礎演變而來者。吾人根據文法家、銘文及戲劇中所知，摩竭陀語之主要特點，巴利語中俱無。根據若干字音字尾之變化，柏樂天及拉蓀二氏反對巴利語即摩竭陀語之論斷。

韋斯特加德氏，繼之有孔氏，認為巴利語為烏加依利之方言，